第一章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1937.12—1938.12)

1. 国民政府西迁重庆

【国民政府议决迁驻重庆】

抗战爆发后特别是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处境危艰。为更有效地组织领导全国抗战，国民政府议决移驻重庆。

国民政府自1927年4月在南京建立以来，一直以南京为首都。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慌忙迁都洛阳。随即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以洛阳为行都"①。由此开始了国民政府选择陪都、行都的历程。

①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35年 3 月，蒋介石率大批幕僚飞抵重庆，策划追剿红军，统一川政。从此，南京国民政府又开始注重西南建设。并力图把西南作为今后对日战争的根据地。 3 月 4 日，蒋在总理纪念周讲演时第一次指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① 7月,蒋面对即将来临的中日战争，再次指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0月 6 日，蒋在成都出席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演时又说：“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两天以后,蒋在另一次讲演中又强调：“日本人无论在东三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了，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② 蒋还确立了“改革四川的政治，整顿四川的军队，转移四川的风气，开发四川的交通，统一四川的币制”的建设方针。并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负责筹划、组织和督促，从而为控制四川军阀、中央军势力进入四川以及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顺利地迁都重庆奠定了基础。

七七事变爆发后，首都南京安全已成问题，蒋介石手令南京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实施动员演习及准备迁址办公并限三日具报”。奉此,行政院于7月 27 日召集各部会举行会议。决定：“关于迁址办公：1。第一部各机关办公地点疏开，即假定敌机轰炸或敌舰开炮时，各机关在城内或外，准备民房秘密办公，并先登记负责人和电话号数等，以资联络。 2。万不得已时，则迁移他处办公

①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台湾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 329页。

② 叶育之《四川史地表解》1941年成都出版（总裁讲演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

（如衡阳）。凡须永久保存之重要文件，先行迁地保管，至各机关之实行迁移，则须候命实施。”

在芦沟桥事变后第25次会议中，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就提请与会者：对战时政府所在地应加以慎重、全面的考虑。他指出：“战时政府所在地应加研究(是否以武汉为宜？)”但与会者未予表决

1937年8月7日，国防会议决定在上海发起进攻，调敌东来，何廉得知后，晋谒蒋介石请示“政府迁都何处”？蒋未置答复。①

8月14日，国防最高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决议：外侮虽告急迫，为稳定军心、民心，政府仍应暂时留驻首都，不必迁移。②

但在8月13日,四川省主席面陈蒋介石“建议中央迁川”。蒋介石“甚表嘉许”。后来由于淞沪战事扩大，蒋便明确告知国民政府内的一些高级幕僚何廉等“我们将迁都四川重庆”,并要求何廉“以此为基础计划同各部开会商议”。自此以后，南京国民政府内的一些高级官员已开始作迁都的准备和行动，因为“大家都认为，不要很久，所有政府单位都要撤退到重庆去”。

10月下旬，淞沪抗战的局势日益紧张，首都南京所受的威胁亦愈趋严重，转移政府、迁移国都已迫在眉睫。10月29日，蒋介石以国防最高会议议长的身份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抗战前途》的讲话。讲话分析了抗战以来敌我形势的发展变化，指出了迁都重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蒋介石称：“军事上最要之点，不但胜利要有预定计划，即挫败亦要有预定的打算。不但胜利要立于主动的地位，就是退却也要立于主动地位。然后一时的挫折，不致有全盘溃败之忧，而可以把握最后的胜利。今天我们主动而退，将来即可以主动而进，大体上说来是不足为虑的”。③最后，蒋介石明确宣布：为坚持长期抗战，国

① 以上材料均引自《重庆地方志》1992年4期，唐润明文。

② 《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3册，第832页。

③ 李守孔《八年对日抗战真相》第121页，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6月版。

民政府将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敌大后方。

10月30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也决定迁都重庆。31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并电告前方将士：“国府决迁都重庆，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

11月9日，刘湘“以淞沪国军转道，国府有迁都重庆之议”，乃由成都经西安飞抵南京，请示抗战机宜，并力促中枢迁川，领导长期抗日作战。

11日，蒋介石谒林森主席，会商迁都重庆事宜。迁都重庆之议乃定。

11月17日晚，作为专门审议国防方针、国防外交方针、国防事业及有关处置国防紧急事变事宜的国家最高决策机关的国防最高委员会，在铁道部防空室举行会议。会议议决：“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办公”。

国民政府之所以择定西迁重庆，这是因为：其一，“七七”事变后，华北平原已被日军侵占，上海失守，南京危急，必须从速迁都。而洛阳已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下，西安也有危险；至于武汉、广州等地，更是易攻难守，故相比之下，只有重庆为宜。其二，重庆为西南重镇，地处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口，东出三峡，西指成都，南去滇黔，北到汉中，水陆交通较为方便，为四川门户。而“四川地大物博，甲于各省”，移驻四川，对于持久抗战和‘抗战建国’，其‘前途之希望，亦必无穷’。① 其三，经过参谋团和重庆行营近三年的努力，重庆和四川已为国民政府所控制，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同时，四川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人民勤劳勇敢，可为抗日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能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创造有利的条件，“惟有以我们新的四川人才可以造成新的四川，建立新的中国”。② 总之，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

① 《民国川事纪要》1937年11月26日。

② 《四川经济月刊》第3卷，第2期(1935年)。

11月20日,国民政府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从而宣告完成了迁都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法律程序和最后手续。《宣言》称:

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濠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11月21日,《大公报》发表社论,谓:“此次抗战,本来要长期,国府在任何地点发号施令，都是一样贯彻于全国。重庆是庆祝复兴，我们谨祝此宣言为中华复兴之开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同一天，四川省主席刘湘电呈林森主席，欢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电报云：“国民政府主席林钧鉴：倾读我政府宣言，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移驻重庆。有此坚决之表示，益昭抗战之精神，复兴既得根据，胜算终自我操，不特可得国际之同情，抑且愈励川民之忠爱。欣诵之余，谨率七千万人翘首欢迎伏乞睿鉴。职刘湘叩”。①

蒋介石也为迁都重庆，电勉全国各将领作更坚决勇敢之奋斗。其电云：“国民政府移驻重庆，我前方军事不但绝无牵动，必更坚决奋斗，就整个抗战大计言，实为进一步展开战略之起点。我前线将士自兹一心杀敌，更无顾虑，遵有计画（划）有步骤之策略，作更坚决、更勇敢之奋斗。中正必与我全体将士共安危、同生死，以尽我革命军人之天职，而策光荣之胜利”。②

国民政府决迁重庆，向国内和全世界表明中国在外来强暴面前不甘屈服和决心抗战到底的气概。“迁都，是要有很大决心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日两国之间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是甲午战争。当时，以康有为为首的一大批爱国志士发动‘公车上书’,向清政府提出三条建议,其中之一是‘迁都’，但清政府就无法做到，甲午战争很快以中国的‘城下之盟’而告终。第二次是相隔三四十年后的抗日战争。这次战争是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完全战胜外来侵略者的战争。当然，那时的国外环境同上一次都已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这次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断然将战时首都迁到重庆，这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在抗战初期起了有力的动员和鼓舞士气的作用”。③“这件事做得好，在历史上是值得肯定的”。④

① 《申报》1937年11月22日。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作战经过》(二)(台湾)第231页。

③④ 金冲及《应当重视抗战时期陪都史的研究》见《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第1—2页。

【组织工业大内迁】

国民政府在决定西迁的同时也决定把沿海地区那些与国防和国计民生有关的企业迁往内地。

中国工业虽有数十年之历史，但大部都集中于沿海各埠，如上海，青岛、天津、杭州等地。其他地区较少，至于西南各省尤为落后，如要准备长期对日抗战，自需保全势力，故“七七”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即开始拟具拆迁东南及各大都市的工厂于西南、西北之计划

1937年7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设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决定立即对粮食、资源、交通器材、医药用品、燃料等实行统制，其中对资源的统制指定由军委会下属的资源委员会召集有关部门会同筹办。24日，资源委员会遵令召集实业部、军政部、财政部、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首脑开会，决定分为财务、矿冶、燃料、机械化学、棉业、建筑材料、牲畜皮革、专门人才8个组进行讨论，其中机械化学组建议迅速迁移机械及化学工厂，以应兵工需要，并派员先行接洽。当由资源委员会派工业联络组组长林继庸赴上海与厂家洽商，劝导迁移，并约厂家派代表到南京共商迁移办法。

7月28日，林继庸奉命召集机械及化学工业会议，提出上海工厂内迁问题。29日，林继庸又奉政府之命由南京到达上海，与工业界的胡厥文、吴蕴初、支秉渊等商量迁厂办法。30日，与上海机器五金业同业公会商定迁厂原则。

与此同时，资源委员会根据商洽结果，拟具迁移工厂提案，将机械、钢铁、煤气、橡胶、制罐及民营化学工业等6类工厂的主要机器设备内迁，并请政府补助迁移费共56万元，拨给建厂地500亩，代商银行低息借款329万元、奖励金每年25万元，以10年为期①。因时间紧迫，该提案迳送行政院审批。8月10日，行政

①《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6、37页。

院召开第324次会议，通过了首先将上海工厂拆迁内地的计划。同时决议：(1) 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及实业部会商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林继庸为主任委员①. (2)“奖励金暂从缓议”，其余各款通过，立即执行。②.

林继庸在上海，经同各业代表会商后，一致决定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由各厂家互推负责人员组成。同时还决定在闸北、虹口杨树浦一带的工厂，先将机器抢拆至租界，再由苏州河起运；其在南市一带之工厂，则集中闵行北新泾或南市起运。凡机件、材料、半成品、工具等，经审查准许迁移者，发给装箱费,每立方呎三角五分 运至武昌者,每吨53元；成品运费准发至镇江，每吨12元。其在危险地带，可不待检验，迳自装船运出。其应领费用经殷实厂商作保，亦可发给，俟到镇江或汉口再为检验证明。迁移工厂先以武昌徐家棚为集中地点，然后再分配地区，继续迁移。为便于拆运，政府在镇江及武汉等地设站接运。 ③

淞沪会战爆发后，许多民族资本家出于爱国热情，纷纷要将自己的工厂内迁。于是，请求内迁的厂家大大超过政府原来的计划数，原提案早请批准的156万元迁移补助费已远不敷分配。9月18日，资源委员会又向行政院提出《迁移工厂扩充范围请增经费办法》,请求再迁天原、天利等化工厂和三北、公茂等造船厂以及中华书局等文化印刷厂，要求政府再补助迁移费52万元，拨给建厂地430亩。 9月23日,行政院召开第330次会议，同意并批准资源委员会的扩大迁移计划，并议决“请工矿调整委员会召集军政、财政、实业、教育四部及资源委员会审定办理”。工矿调整委员会负责扩迁工作，原上海迁移监督委员会只对原批准迁移的工厂继续协助办理。实际上是国民政府扩大了迁移的工作机构。

①③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7年 7 —12月第249页,第270页。
② 《民国档案》1987年第 2 期，第36页。

在加强内迁机构的扩建和经费的调拨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千方百计调动运输机构的积极性，以倾其全力抢运这些内迁工厂的机器设备、原料、工作人员，半成品等。 1937年9月1日，国民政府以日军侵犯上海战事日趋激烈，长江下游江阴水道业已封锁，为维持军民运输，令轮船招商局、三北、大达、大通、民生等16个轮船公司，在南京合组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统筹调配船只，维持民运与军运。三北、大达、大通等航业公司办理上海、镇江联运，由上海日晖港经内河（沿苏州河转南运河）至镇江，过南京转运大后方。

在国民政府的组织下，从1937年8月起，以工业重镇上海为中心，在北起山东青岛、南迄广东、香港的广阔地域上，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工厂内迁的浪潮。

从1937年8月到1938年初，为工业内迁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内迁的兵工厂和其他兵工单位主要有15个。如上海炼钢厂（于11月分批迁往武汉）、金陵兵工厂、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1937年10月迁往重庆）、济南兵工厂（9月奉令迁移西安）、航空兵器技术研究处（11月由南京迁抵武汉）、广东第一兵工厂（12月迁往广西融县）、巩县兵工分厂（11月迁往四川）、炮技处（由南京迁移内地）、中央修械所（12月迁往衡阳）、广东防毒面具厂（迁往广西柳州）、应用化学研究所、百水桥研究所和弹道研究所（1937年冬由南京迁往重庆）、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11月迁往株洲）。

内迁的民营工业：由上海迁出的民营工厂共148家，运达武汉的机器及材料重达1.46万吨技术工人2500余人。其中机器五金业66家，造船业4家，炼钢工业1家，电气及无线电业18家，玻璃陶瓷业25家，化学工业19家，文化印刷业14家，纺织及印染业27家，食品工业6家，其他工业6家。这些工厂迁到武汉后，仅有小部分工厂于1938年初复工生产。

1937年12月，日军侵占南京后，侵略矛头直指武汉。为保障

内迁工厂的安全转移，国民政府又下令把迁到武汉的工厂和武汉原有的机械五金、纺织印染和化工等工厂，再迁到大后方，以筹建战时工业。

1938年春至1939年冬，为工业内迁的第二个高潮。这一时期迁往内地的兵工企业主要有：钢铁厂迁建委员会（1938年2月奉蒋介石之令将汉阳钢铁厂择要迁移，5月开始，先后迁到重庆大渡口）；第50工厂，即广东第二兵工厂，（1938年4月由广东清远县迁往重庆）；第三工厂即上海炼钢厂（1938年2月并入钢铁厂迁建委员会、6月迁往重庆）；第22工厂即汉阳火药厂1938年5月迁辰溪；第一工厂即汉阳兵工厂，1938年6年迁辰溪（次年奉令迁重庆）；第11工厂、原巩县兵工厂，1938年迁往长沙（次年迁重庆）；第30工厂、原济南兵工厂，1938年4月迁重庆；第10工厂，原炮技处，1938年6月奉令迁到重庆；航技处，1938年夏迁四川万县；中央修械所，1938年冬迁贵阳。此外还有第40工厂、第41工厂等，都分别于1939年底迁往四川或贵州桐梓。

这一时期继续内迁的民营工业主要是外地迁汉的170余家工厂的机器及材料，悉数沿江西迁四川。武汉的民营工厂也迁出168家。其中包括纺织业64家，机器五金业75家、化工10家、印刷6家、食品厂9家、物品制造厂4家。这些厂，大部分迁川、部分迁湘，工人亦多随厂西迁或南迁。

在武汉撤退时，从上海、南京、芜湖、九江以及武汉溯江西运的工厂机件和物资，估计总量在20万吨以上，辗转迁徙，历时半年有余均集中于宜昌一地，待转船西运入川。此外，尚有相当数量的工程技术人员、工业管理人员以及技术工人，亦集中宜昌候船西上。全国国营的兵工业、航空工业以及重工业器材，亦堆集宜昌待运。宜昌这时成为中国工业内迁的中转总站。

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以国事为重，慨然将民生

实业公司的所有船只投入抢运。

1938年10月，交通部航政局在青滩、洩滩、兴隆滩等险要处修建机械绞滩设备。由于民生轮船公司的船只只有24艘，运输能力有限，交通部便调集木船1200多艘于宜昌。船工们冒着敌机的轰炸，忍受着船只的沉毁、生命的牺牲与轮船海员一道昼夜装运，与民生轮船公司共同创造了宜昌撤运的奇迹①。

沿海及沿江工业内迁后，分别在西南、西北建立了如下新的工业区：(1) 重庆工业区，此工业区最为重要与最为集中。沿长江东起唐家沱，西至大渡口；沿嘉陵江北至磁器口、童家桥；沿川黔公路南至綦江，构成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在重庆的工业命脉。也是当时后方唯一的综合性工业区，以兵工、炼钢、机械、造船、纺织、化工作为这个工业区的骨干。(2) 沱岷工业区，在四川的沱江和岷江流域，即在泸县、内江、五通桥、自流井地区，建立有发电、酒精、制酸、制碱、造纸、炼油、炼焦等工业。(3) 涪长万工业区，在四川万县、长寿、涪陵一带，建立有水电、榨油等工业。(4) 昆明工业区，建立有发电、机器制造、电工器材、冶炼等工业。(5) 西安工业区，以陕西的西安、宝鸡为中心，建立了发电、纺织、机械等工业。(6) 沅陵、辰溪工业区，以湖南的沅陵、辰溪为中心，包括安江、榆树湾等，建立了发电、兵工、电器、水泥、纺织等工业。此外还有衡阳轻工业小区、四川酉阳龙潭镇的汽车修理、装配与炼油工业小区、甘肃玉门油矿区。

内迁工业，在国民政府的扶持下，加紧生产，对大后方经济发展，对支持抗战，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构成后来重庆国民政府的经济支柱。

①史称中国实业界的“敦克尔克大撤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教育、文化机关的大迁徙】

抗战以前，中国共有高等学校108所，多分布于平、津、沪、宁等沿海地区。1935年，华北局势紧张，清华大学在长沙岳麓山营建校舍新址，南京中央大学也将学校的图书仪器装运重庆，并将校址选定在重庆大学附近的松林坡，天津的南开大学也在沙坪坝筹建校址。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着令平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南迁长沙。 8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便在北大校长蒋梦麟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主持下，在南京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处。 9月2日，教育部令沿海、沿江各省、市教育厅、局，对于设在各主要城市之公、私立学校，倘已受或易受敌人袭击者，应尽力设法在比较安全之内地县区或乡村布置开课，并赶造防空避难设备，以期青年学业不致中辍。

1938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全国各地学校的迁建工作。决定把一些重要的国立、省立高校和研究所迁移到西南、西北各地，其中以重庆为重点。于是，以上海、北平为主体,以及广州、南京、浙江、天津等地的大批国立、省立和私立学校开始大规模向内地迁徙，出现了中国教育史上教育重心由东向南的转移。截止1939年，全部或部分迁入后并相继复课的大学52所，迁入上海租界及香港的25所，停办17所。设在平、津的学校，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长沙合组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11月1日开课，1938年 4月迁至昆明）外，其余均迁往陕西、甘肃境内。设于苏、浙、皖三省及沪、宁两市的学校，分别迁至湖南、四川两省，其中迁入四川的最多，达31所。1940年夏到1943年春，原迁入上海租界、香港以及广西一些地区的高校又被迫内迁，其中有11所迁四川。1944年豫湘桂战败，一批院校再转辗迁入四川等地。到1944年，迁入四川的高校达48所，其中重庆地区为 31 所（内含璧山 3 所、巴县 1 所、江津 2 所）、成都 7 所、万县、乐山

各 2所，三台、金堂、泸县、南溪、江安各 1所。

迁入重庆地区的31所高等学校中，计有大学 9所、大学研究所 1所、独立学院10所、专科学校11所。

迁到重庆的这些院校（包括其他内迁的学校）在国民政府的救济、安置及扶植下迅速恢复开课，使后方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如中央大学，迁到沙坪坝松林坡，设有文、理、法、农、医、工、师范 7 个学院，是当时国内学生最多系科最完备的大学；后因校舍紧张，还将新生院设磁器口柏溪，医学院及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设到成都。中央政治学校，迁南温泉，设有政治、法律、外交、新闻、经济、地政六大系科。复旦大学，迁北碚夏坝，设文、理、商、农 4个学院。陆军大学，迁重庆山洞。兵工学校，迁磁器口小杨公桥。社会教育学院，迁璧山。音乐学院，迁青木关。江苏医学院，迁北碚。艺术专科学校，先迁青木关，后迁沙坪坝对岸盘溪。上海医学院、药学专科学校，均迁歌乐山。朝阳学院迁兴隆场，中央工业专科学校迁沙坪坝、武昌中华大学迁南岸、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曾家岩，后迁江北相国寺、乡村建设学院迁北碚歇马场。

此外，迁入四川的还有一些学校如女子师范学院、教育部特设的大学先修班、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均设在江津德感坝）。戏剧专科学校(设江安)中央研究院、同济大学(设南溪李庄)；上海法学院(设万县)。

私立金陵大学、私立东吴大学、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私立齐鲁大学、私立光华大学、私立朝阳学院、国立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私立燕京大学等迁到成都。

国立武汉大学、江苏省立蚕丝专科学校等迁驻乐山；国立东北大学迁三台等。

在组织各类学校内迁的同时，一些文化机关也先后内迁。中央研究院的总办事处，先迁长沙，后迁重庆；物理所、化学所、

工程所、天文所、史语所、社会科学所迁昆明；地质所迁桂林；心理所迁广西三江丹洲乡；动植物所、气象所迁北碚。国立中央图书馆初迁白沙，后迁重庆。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初运重庆，后迁至乐山乡间。中央电影制片厂、中国艺术剧社也由南京迁重庆。此外，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中央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大公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商务日报》等，以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正中书局、生活书店等也先后迁到重庆。

此外，绝大部分文化界、艺术界人士也云集重庆。使重庆不仅成为战时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而且还成为文化中心。这些内迁的教育文化机关，构成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教育文化主体。

【国民政府中枢迁渝办公】

1937年11月16日，当国防最高会议作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正式决议后，林森主席即席辞别，于当晚乘军舰永绥号溯江西上。“当场空气沉鬱。有人起谓重庆乃重生之意；迁都重庆，乃更生之兆。最后胜利可操左券，与会人员精神为之一振”。①

当天，国民政府所属机关开始西迁；财政、外交、交通等部及卫生署先迁汉口。当时，各部官员及所有公务人员等万余人，陆续乘轮船溯江入川至渝，机关政府的文卷物品等数万吨也随即用轮船载运重庆。

11月19日，林森率国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抵达汉口。次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移驻重庆宣言。随后，林森一行10余人由汉抵达宜昌，23日，又转乘民生公司的“民风”轮，星夜兼程，继续西溯长江，向重庆进发。

①《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一号。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7年7—12月，台湾编印。

由于国民政府发布移驻重庆宣言及政府各部会纷纷暂迁汉口。故英、美、苏、德、法、意等国驻南京大使馆人员亦于11月23日离京赴汉，以便随国民政府西迁。①

重庆市政府工务科在得知国民政府决迁重庆办公之令后，奉令将曾家岩重庆高级工科中学改建为国民政府府址。经昼夜赶工，于11月25日改建完成。

11月26日，林森一行抵达重庆。民众10余万人夹道欢迎。17时。安抵李子坝官邸。由参军长吕超代为接见渝市新闻界，谈国府移渝情形。吕参军长谈话大要如下：……此次国府移渝，随主席同来者约十余人，文官、参军、主计三处职员，定29、30两日，分乘民政、民贵轮到渝，国府预定12月 1 日开始办公。至各院、部在渝开始办公之日期，则预到达之早迟而定。②

11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叶楚伧、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王子庄以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吴稚晖、丁惟汾、钮永健等抵达重庆。同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参军处及主计处西迁人员也全部抵达重庆。附辖的国府卫队，乐队及勤务，也同船到达。

12月 1 日，国民政府即在重庆简陋的新址正式办公。同日，行政院通电知照各单位，该院在渝办公。其电云：“各省市政府、西康省委员会、威海卫管理公署：本院依照中央决议，兹经移渝办公，特电知照，并饬属知照”。③

12月 7 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正式在范庄举行迁渝后的首次执监联席会议并开始在渝办公。

虽然国民政府已正式宣告迁都重庆并开始在重庆办公，但其

① 《申报》1937年11月23日。
② 《四川文献》第75期，第31页。
③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2日。

时迁到重庆的只是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的极少部分，而大多数的特别是那些主要职能部门，诸如军政、外交、财政、内政、交通等部，都只暂时迁到了武汉或长沙等地尤其是武汉。所以，当时的武汉实际上成了中国战时的指挥中枢和领导中心。

1938年夏，日军加紧进攻，国民政府军节节后撤，华中战事日益吃紧，武汉岌岌可危。6月9日，国民党驻汉党政军机关又奉令开始撤退。党政机关移驻重庆，军事机关移驻湖南。于是，又有一批党政部门迁驻重庆。

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的其余党政军机关，限5天内全部移驻重庆。奉此，先迁到武汉的各机关、民众团体、工厂、学校等，又开始了大规模的西迁：7月18日，中央社会部移渝并开始办公；27日，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漠、常务次长曾镕甫抵渝；29日,行政院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侨务委员会委员长陈树人等抵渝；7月30日，国民政府要求驻汉各国外交人员迁往重庆；8月1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宣布：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驻汉办事处一律撤销，限期迁移重庆。8月2日，内政部部长何健财政部次长徐堪及中国青年党主席曾琦等抵渝；3日，行政院副院长张群、中央赈济委员会代委员长许世英等抵渝；4日，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抵渝；5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及邵力子、王世杰、彭学沛等抵渝。至此，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驻武汉（除军委会下属有关机构迁长沙外）各机关全部迁到重庆，并相继开始办公。与此同时，各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中共代表团各代表以及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外国驻华使节等亦纷纷聚集重庆。

国民政府迁渝后，机构设置仍与在南京时大体相同，实行“五权分立”，即设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等监察等五院。具体组织机构是：

（一）国民政府：设主席。下辖五院及直属机构。国民政府本身设有参军处、文官处、主计处等。

（二）行政院：下辖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经济部、教育部、交通部、农林部、社会部、粮食部、司法行政部、军政部、蒙藏委员会、侨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导淮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中央革命债务委员会、工业标准委员会、卫生署、地震署等。

（三）立法院

（四）司法院：辖最高法院、行政法院、中央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最高法院检察署。

（五）考试院：辖铨叙部、考选委员会。

（六）监察院：辖审计部。

（七）国民政府直属机构还有：国立中央研究院、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史馆筹备委员会、西京筹备委员会、国民政府政务惩戒委员会、训练总监部。

（八）国民参政会、中央政治委员会。

（九）国民党中央机关：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部、中央海外部、中央调查统计局。

此外，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还有如下机关：交通部驻上清寺交通巷；卫生部驻新桥；粮食部驻打铜街（今食品公司侧）；粮食部四川粮食储运局驻牛角沱（今川江电机厂）；农林部驻上清寺；航空委员会驻国府路；全国慰劳总会驻中兴路；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驻春森路；警备司令部驻中营街；重庆海关驻太平门。

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驻川东师范校内；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驻南温泉小泉；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驻复兴关。中央广播电台、国际广播电台驻中三路（今重庆市广播电台）；中央日报社驻黄家垭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